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

世界现代史

新论

主编：张宏毅
沈永兴
沈双一
李世安

重庆出版社



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编

世界现代史

新论

主编：张宏毅
沈永兴
沈双一
李世安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现代史新论/张宏毅等主编 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5

ISBN7-5366-5292-5

I 世 II. 张 III 世界史:现代史—研究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671 号

▲世界现代史新论

张宏毅 沈永兴 主编
沈双一 李世安

责任编辑 朱荣瑚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1/32 印张 16 375
字数 390 千 插页 2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5366-5292-5/K·277
定价:24.00 元

序

齐世荣

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现代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于2000年7月24日至27日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并以20世纪的历史剧变为总题目进行学术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近百篇,现从中选出34篇,汇为一集出版,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个世纪,也是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生活在21世纪以及其后若干世纪的人们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研究当代史,有其特殊的困难。恩格斯说:“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他接着说:“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恩格斯虽然指出了研究当代史的困难和局限性,但他仍然认为“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恩格斯以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马克思同样遇到了上述的不利情况,但马

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①

除了恩格斯上面所说的撰写当代史容易产生错误的原因以外,还有由于撰写当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个人的家世、党派、民族、国家等等,易动感情而难以保持客观态度。梁启超自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②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也有同感,说:“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③史学界都知道,陈寅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其实他对清史也很感兴趣,不过在晚年以前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关清史的论文。^④1944年冬,他对他的学生石泉(原名刘适)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⑤直到晚年,陈寅恪才以口授方式,由他人笔录,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文,^⑥可惜在“文革”中又复散佚,今仅存残篇,难以充分看出他个人的感情在叙述晚清历史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再次,由于档案保密的原因(今世界各国通例,三十年以前档案解密),当代史作者除特例外,基本上看不到最近三十年的档案,这当然也是一个不小的缺陷。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当代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各个方面,诸如时代气氛、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的体会,这种体会不可能以文字形式全部留传下来,即使大部分流传下来,后人的领会总会与前人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当代人所

写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是第一手的史料；当代人对当代史的论述也有其独到的地方，不是后代史学家都能超越或取代的。

后代人写前代史，自然有其优越性，例如能看到许多前人看不到的解密的档案；能采取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于演变过程已经终结的运动、事件和已经盖棺的人物，在多年之后，反倒能看得更清楚，作出更准确的分析和评价。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⑦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十月革命对苏联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仍然是不可磨灭的。^⑧列宁的这句话是说得深刻的，也适用于评价其他的伟大历史事件，例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后代人写前代史，还有不利的一面。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但是如何“神游冥想”，如何才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并未进一步说明。赞赏陈寅恪这段话并予以引用的人，也未能说清楚。对古人“具了解之同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几篇文章或几本书，就能解决的。诸多学派众说纷纭，恐怕要长期争论下去，甚至永远争论

下去。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说：“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才能拼接成形。”^⑩

总之，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人写前代史，都各有其局限性，又都各有其优越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借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⑪

本论文集的作者大都是中青年，风华正茂，肩负着发展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重任。我希望他们能够不畏研究世界当代史的困难，刻苦努力，勇攀科学的高峰；也希望关心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史学前辈和各级领导多多给以指导和帮助。

近年来杂事丛集，学殖荒落，对这本论文集本不敢置喙。张宏毅、李世安两位同志一再索序于我，只得聊赘数语如上，权以应命。

2000年12月15日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06—507页。

②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③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④上文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等诗文，虽涉及晚清历史，但非专门研究清史的学术论文。

⑤石 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⑥见《寒柳堂集》。

⑦《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563页。

⑧参见拙文《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载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期。

⑨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⑩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36 页。

⑪见《〈明清史料首编〉序言》。蔡元培的这两句话原来是指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这两类史料各有短长,应当综合使用。

目 录

序..... 齐世荣(1)

建立科学的世界史体系

——简论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 李世安(1)

论现代科技进步与人类进程的辩证法 沈双一(14)

世纪之交的历史回想 刘德斌(28)

论当代亚非国家“民族统一构建”进程

——兼谈 20 世纪非洲历史之认识问题 刘鸿武(44)

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制定与中国

抗日战场 韩永利 胡德坤(64)

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国家政治运作机制演变分析..... 许 平(90)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才珍(102)

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一体论..... 王家福 曹秀莲(115)

二十世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社会探源..... 王红生(127)

论 1942 年中美英关于反攻缅甸战略决策的演变 ... 冀伯祥(142)

突破农业现代化的瓶颈

——印度政府减少农村贫困的努力之探讨..... 金永丽(154)

欧洲议会在欧共体立法与决策中地位和作用的演变

及其限度 黄正柏(165)

20 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与

欧洲的衰落 吴伟(195)

论 20 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及其演变 黄民兴(210)

资本主义母体内是否孕育着新的社会关系的萌芽
..... 伍宗华(223)

科技革命与 20 世纪史 吴建华(229)

试论战后初期中苏关于新疆俄侨的交涉 陈香苓(246)

改革与现代化:现代化研究的新视角 姚大学 姜桂石(256)

冷战起源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洪邮生(266)

30 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 熊伟民(284)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阐释美国 30 年代大萧条的原因
..... 关绍纪(302)

20 世纪前期的艺术与历史

——借西方现代画家的眼光看两次世界大战 邓晓(310)

略论五六十年代北约核战略的建立与发展 许海云(323)

政府的作用

——比较日韩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杨黔云(342)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论略 纪胜利(352)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周边国家 李健(363)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

对台海局势的影响 王坚德(374)

论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 王伟(390)

论战后英国共识政治 王皖强(414)

试论现代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黄跃庆(434)

台湾问题与国际法	杨和平(449)
论冷战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	刘少华(467)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常云平(479)
关于科技革命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问题	温 强 吴 迪(491)
后记	(511)

建立科学的世界史体系

——简论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

李世安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在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正确划分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问题是构筑一个科学的世界史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新世纪之初,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深入探讨。

一 1949年后我国在世界近现代史开端问题上的争论

1949年后,我国的世界史体系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是西方体系,第二种是苏联体系。

西方体系是指西方史学家建立的世界史体系。这种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定在 15 或 16 世纪,包括“文艺复兴说”^①、“1492 年说”和“地理大发现说”^②、“1453 年说”^③和“1500 年说”^④等几种主要观点。这种体系把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定在 1871 年德国的统一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⑤。但是上述观点在 1978 年前统统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或“唯生产力论”,没有被我国史学界正式接受。

1978年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史体系是苏联体系。苏联在划分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时期时,是以革命为分期的主要标准。列宁把1789年法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斯大林在1934年曾经同意这一分期方法^⑥。但是到1940年,斯大林接受了苏联历史学家的建议,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确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此,苏联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成为定论^⑦。

1949年后,由于受苏联影响,我国的正式教科书中,都以苏联的分期作为标准。虽然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场合对这种分期标准提出了意见,都未能动摇这一主流学术观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思想空前解放,我国开展了关于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到1984年,这一讨论达到高潮。《世界历史》杂志在1984年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论述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例如1984年第2期发表了刘远图先生的文章《世界史体系问题琐议》;1984年第3期发表了李纯武的《有关〈世界通史〉体系的几点意见》;1984年第4期发表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点意见》,1984年第5期发表了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开拓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等。1985年和1988年,《世界历史》杂志又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历史研究》于1984年也发表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文章。

但是,这一时期的讨论,没有越出以革命为世界近现代史分期标志的框架。论争的焦点仅集中在世界近代史应该以英国革命为开端,还是以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史学家在世界近现代史分期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突破了以革命划分世界近代史的分期框架,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在研究其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例如吴于廑和齐世荣在其主编的《世界通史》6卷本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一些教材也采纳

了这一观点。例如 1999 年出版的由李植枏主编的《宏观世界史》一书,就采用了这种分期方法。一个比较合理的科学世界史体系开始建立。

然而在《世界历史》2000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综述》中,一些学者对吴于廑、齐世荣的分期方法提出异议。麻光炳认为上述分期方法有“唯经济史之嫌”,阎照祥则提出历史分期“应是相对的”观点,不同意以马克思主义的五个社会形态作为分期的标准。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观点呢?

二 世界近代史始于何时

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体现出近代产生的特征,具备该时代开始时应该具备的基础,以及反映出这是一个完整历史时期的开始。在划分历史时期时,应当而且必须从社会经济形态说起,以找出该时代的历史基础。因此不应否定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正相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比较科学地概括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特点,为划分历史时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例如在划分古代时,可以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包括进去;中世纪包括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部分:近代部分是资本主义产生和确立的时期,现代则视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并存的时期。但是应该注意,中世纪并不包括整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末期属于近代范围。而这种分期既与传统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方法吻合,而且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既容易被人们接受,又概括出了各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与内容。

马克思没有明确地给世界史作过分期,但曾作过有倾向性的

论述。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他并没有把革命当成惟一的分期标准。马克思说过 1648 年革命是 1789 年革命的原型,而尼德兰革命又是 1648 年革命的原型。但他强调的是革命本身,而不是用革命来划分历史时期。同时,他也不是只强调以生产力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他强调经济在划分历史时期的作用:“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但是他又强调并阐明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发展时,宣称:“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完整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视为世界近代史开始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在这一段话中,看不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具体年代,但可以肯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在封建社会。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作了说明:“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⑩。恩格斯在谈到“大的资产阶级运动”时,把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托马斯·闵采尔等都算在内。而这一时期正是在 16 世纪上半叶^⑪。因此近代应包括封建社会晚期。

后来马克思关于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逐渐明朗。他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明确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与劫

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⑫既然“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因此也就可以把它当成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因此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地理大发现说”的西方分期方法是不矛盾的。

中国学者事实上承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和“地理大发现说”等观点,“符合和接近事实”。但由于其具有“根本缺陷”,即“唯心史观”,所以这种分期方法被斥之为“欧洲中心论”^⑬。这样简单的批评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不应该抹杀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对此,李纯武说:“既要破除‘欧洲中心论’,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决不忽视或不充分估计近代欧洲在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⑭。

根据上述分析,应该说以1500年左右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要选择一个具体的年份,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未尝不可。

在1500年左右,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科学基础与哲学基础。科学革命奠定了近代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哲学革命奠定了近代的意识形态基础。

中世纪赖以存在的科学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神权世界观。但1513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地球是世界的中心的说法,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引起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革命。后经布鲁诺、伽利略等人的努力,到牛顿时,完成了由哥白尼开始的科学革命。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把整个世界归纳到可以用数学表达的模式中去,被资产阶级引用去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性”是永恒的,“自由民主”是绝对的真理。总之,牛顿的物理学打倒了神学世界观,确

立了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原则的世界观。此后,资产阶级为实现理性原则,为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内战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等等。

在科学革命推动下,西欧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与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相适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思想。他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而市场则可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弊病。

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发生了哲学革命,产生了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洛克和斯宾诺莎等资产阶级哲学家。他们批判了宗教神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鼓吹“理性”,要求公民服从国家的领导,实现人类生而有之的“天赋之权”。为了普及理性原则和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运动。因此,哲学革命奠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等都全面发展起来。从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历程来看,以1500年左右世界史的开端,能比较完整地体现近代史的内容和发展规律。若以革命为近代史开端的划分标志,则会显得有头无尾,来龙去脉不甚清楚。

上述道理,古今中外皆然。例如中国学者在划分历史时期时,也非常强调要反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梁启超先生把人类历史划为“时间段”,他称之为“时际”,把空间作为“空际”,并断言:“其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然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⑤

在讨论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之后,就比较容易划分世界现代史的开端。